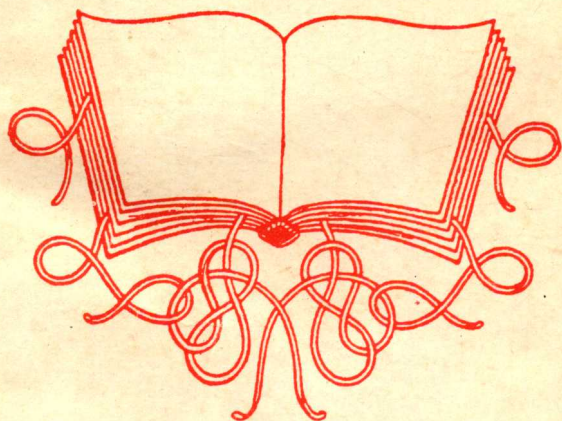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文艺思想研究

• 9 •



吉林大学出版社

A 841.691

阅 览

713

9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 编

• 9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 编

• 9 •

责任编辑:王大椿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8.5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9 千字

印数:1—800 册

ISBN 7-5601-1576-4/I·72

定价:5.70 元

目 录

坚持运用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公 木(1)

毛泽东文艺思想范畴论 阳友权(17)

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林宝全(35)

试论毛泽东的实践观与他的艺术认识论 欧恢章(51)

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毛贵廷 周成平(64)

论毛泽东的美学智慧 王 进(79)

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的时空透视 韩福奎(91)

试论毛泽东形象的崇高 刘长海(101)

浅论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艺术 王岱英(107)

试论毛泽东诗词中的崇高美 张 帆(120)

“双百”方针与社会主义民主 孔庆尊(125)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题 立 政(132)

毛泽东文艺批评观二题 程继田(143)

“两结合”源流纵横谈 刘淮南(1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论纲 敖 忠(172)

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 何国瑞(187)

文艺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吴 韵(199)

社会主义改革与文艺的多重结构 朱 晶(20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市场 王胜秋(219)

论文艺的理性本质与情感本质 江建文(225)

文学创作实践过程的主观和客观 毛庆耆(239)

从中国现代文学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王润龙(248)

政治视野与艺术视野 邓牛顿(260)

后 记 (264)

(1) 本 会 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71) 叶太明 中国文艺理论

(72) 王 健 革命大业的文艺理论

(81) 章 朔 文艺理论

(84) 平 凡 文艺理论

(85) 杜 王 文艺理论

(91) 董 颖 文艺理论

(101) 戴 颖 文艺理论

(105) 黄 健 文艺理论

(108) 周 颖 文艺理论

(122) 章 颖 文艺理论

(133) 刘 颖 文艺理论

(141) 刘 颖 文艺理论

(151) 南 颖 文艺理论

(153) 刘 颖 文艺理论

(181) 章 颖 文艺理论

(182) 刘 颖 文艺理论

(203) 章 颖 文艺理论

坚持运用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公 木

坚持运用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宗旨。它不只是一个标志方向的理论课题,而且是实实在在指导实践的行动总纲。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论证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已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便是已在孕育中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诗人和学者,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当然表明毛泽东是这种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它首先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一系列论著、讲话所阐明的理论原则以及据以制定的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上;在这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代表作。同时还必须注意,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不只是就文艺论文艺,而是高屋建

领；从文艺工作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的角度，来阐发我们的文艺在革命的总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是把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置于整个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加以研究和考察的，从而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乃至文化本质，成为掌握文艺规律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毛泽东的价值观，也便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集中体现为人民主体论。而作为历史辩证的“人民”范畴，决不只是一个感情化了的字眼，“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②它必定是实实在在地承担着社会发展历史任务的所有人的整体。因而在质的标准上坚持“历史进步原则”，同时在量的标准上坚持“绝大多数原则”。这就决定了文艺的人民主体论，即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基本上便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坚持执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③明确提出了“真理与人民利益一致”^④这个具有高度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命题，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条必然结论，一项基本原则：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达到彼此统一的原则。这便使着毛泽东得以科学地论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and 坚持党性原则的根本一致的关系。并进而论证了革命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能够完全一致的关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加以明确阐述，要求我们的文艺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同时，这也便意味着为历史的创造者服务，为推动历史前进服务。至于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自然就要描写、表现人民群众，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和理想；而要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

成一片,由化大众到大众化,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明确阐述了我们的文艺应当做到以及怎样才能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怎样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利用。总之,在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毛泽东的论述是系统的、精确的,作出了许多理论概括和原则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以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核心,也就是以文艺为群众服务以及怎样为群众服务为核心,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世界观与创作、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继承借鉴与创造、歌颂与暴露、文艺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效果、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方针,又提出了“诗要用形象思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等理论,使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系统,更加完善。上述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和创造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它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其真理性与科学性,而成为我们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

当然,我们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甚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并不是源始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反,毛泽东文艺思想,如前文所概述,乃是根生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艺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基础上,然后才得给革命的文艺事业与文艺工作以指导和推进的。就如我们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也不是仅凭一种观念或一张图纸,虚拟塑造,平地高楼,白手起家,决然不是这个样子;溯源也不是初始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而是更早更早,理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艺运动算起。“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它是中国悠久古老文化传统在走向现代化的质变,是世界丰富而庞杂的现代文化在中国新拓的支流,在源头

上虽然纤弱,有如涓涓小溪,自然也便以一支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潮汇入世界文化的汪洋,从而势不可挡地卷起洶洶巨澜,取得辉煌的成绩:以鲁迅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⑧这岂不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初展雄姿的阵势吗?所以直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才得被承认:“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着“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之中也就包含着要研究和解决“‘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正是因为这一点,基于这一情由,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便具有了特殊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或者说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总结了前二十三年,开拓了后五十一年,自然它的影响亦即生命力还要延续下去。1986年10月在“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曾听胡耀邦说过:“我们党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两个突出的飞跃时期,一是延安时期,一是现在(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历史新时期)。”是的,在延安时期,正值三四十年代之交,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全世界进步人类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着伟大正义而胜利的斗争。正是在这抗战时期的延安,正是在其时其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出来成熟起来,实现了“幽灵转世中华相”,把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赋以中华形象。首先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双向跃进,同时它标志着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

的新阶段，它意味着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新形态，它表现出为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莫立了始基。这些深刻且深远的涵义，如果不站在俯瞰全局的历史高度是难于体认的。如果不经历时代风雨的吹打也是不易显现的。职是之故，回忆当年，“毛泽东文艺思想”以至“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还不曾在我们意识中清晰形成，但毛泽东的话语，他的著作和报告，久已拨响了我们人人灵魂的心弦。聆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明确了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进而明确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根本理论和具体实践问题。于是广场里扭起秧歌舞，诗人们纷纷上山下乡去采风。安娜和林黛玉都浴着阳光哼着小调在岭畔上摇纺车，马雅科夫斯基、惠特曼都来和孙万福、李有源对唱朗诵，事实上《讲话》已经开辟出一个文艺的新时代。尽管“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时间还没有形成为我们习用的熟语，而实际上它已经是我们整个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深入人心的指导思想了。待到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古树著华举世珍”，我们的文艺也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老中青三代作家，来自解放区，来自国统区，来自沦陷区，来自五湖四海，济济一堂，欢歌鼓舞，《讲话》更成了普照的阳光，一道强烈的普照的阳光。学习了《讲话》，老舍说：“顿觉心中爽朗，眼界开阔，好象久住在城圈儿之内，忽然出了城门，上了阳关大道，看见了绿水青山与沃野千里。毛主席所说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缩小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而是把它加宽了，叫我看到无边的美景，也叫我有了向从来没有过的新理想。我得到从来没有得到过的鼓舞和启发。使我的创作热情增加了许多信心。”于是他将“五十而知天命”改换为“五十而知使命”，愉快地说：“毛主席叫我看明白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我应有的理想与抱负。”巴金也不胜惊喜地道出这样的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是用笔，并且还用

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着更多的青年的灵魂。”就这么，作家们众口一声地由衷表示：“按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以文艺作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多么光荣，多么重大。”^⑧直到进入 60 年代，毛泽东指引的文艺方向和文艺道路，便益加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所自觉接受遵守。在《讲话》发表 20 周年时，郭沫若曾这样称赞：“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理论方面极系统的阐述。虽然二十多年了，而光辉日增。真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悖。”丁玲也说《讲话》所展示的文艺运动“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它的成就是突出的，经验是丰富的，影响是深远的。”^⑨到此，已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培养了一代人，尔后还将培养广大文艺战线的下一代。

如上述所说，毛泽东文艺思想自然不属于毛泽东一人，而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为之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不仅在建构、探索、阐发方面，而且在宣传、贯彻、运用方面，都曾为我们作出榜样。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自应包括学习和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及其实践成果。这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如毛泽东思想一样，并非两个“凡是”，也不等于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集汇。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在文艺方面，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也不可能都是真理。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相联系，特别是与对当时历史任务的错误判断相联系，当其英明地完成“上篇文章”，又正确地开始“下篇文章”的时候，虽不乏想象，却连续出现败笔。他晚年在文艺工作上也有着明显的失误。由于把主要矛盾摆错位置导致脱离人民，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

确定感导致低估和轻视知识,愈演愈烈的“左”倾论点,直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⑧同样那些违反历史进步,有悖人民利益的文艺工作的失误,也完全是脱离了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违背了毛泽东自己关于文艺问题的正确论述,也理所当然地不能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此一切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恰在这时期,我国文艺战线也如同党政工青妇以及文化教育各条战线一样,在内部团结胜利,外遭帝资封锁的情势下,逐渐生长起一种“虔诚的狂热”和“无容置疑的自信”。于是受着极“左”的导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拔“白旗”,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直到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些又无一不是以“狂热”的“自信”表现出对异己的“不能容忍性”。正是这样,就使我们正确地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向着正确方向运行的进程中,无容讳言地走了一段弯路:“贯耳干雷招旱魃,浇头酸雨惹妖氛”。用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二十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来体现着真善美的谐和统一性并富有开放性的《讲话》精神,作为建国后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既起到了显著的辉煌作用,而又遭到偏颇的阐释与负面的发挥,并由此造成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不能不使文艺思潮的流向偏离正确的航道,以致使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智慧光芒被重重的迷雾所遮掩。就如青年时代曾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等名剧的曹禺,“然而五十年代以后,他的作品却不尽人意。他告诉笔者,自己用功写了,却写得不满意,创作时总感到心里似有什么东西附着。写不畅快,有的勉强写,有的不愿写,而大部分却不敢写。……”^⑨这也正如曹禺在答记者问中所总结出来的“两大遗憾”,他说:“在我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建国以来,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

被写作以外的事情占去了,譬如:接待外宾、出国、各种会议……时间被占据了,创作自然就从生命中退让了。二是缺乏独立思考,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极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脑子还有留存。有些是我意识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却在起着可恶的作用,甚至阻碍我的创作。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剧。”^⑩这是在“干雷”和“酸雨”吹打中的中国作家所感受的困窘。然而,这困窘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所给予的,还是由于失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才感受的呢?

人民遭遇苦难,革命付出代价,文艺受到破坏。而正是在这“贯耳干雷”以至“浇头酸雨”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才经受净化的锤炼与真实的考验。动乱由我们招惹,仍必由我们解决,也只能由我们解决。待到时机成熟:“回天赖有鲁阳戟”。这“鲁阳戟”岂不恰是根生在革命群众深心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吗?它集中表现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文艺理论,也便是在新时期完整地继承、完善和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如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⑪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指明了两代伟人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完善的关系,也深刻地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它使我们得以更明确具体地领会江泽民同志在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迪亚斯采访时有关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谈话的深远意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著作中包含有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的十四大确立这一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于1980年建会之初，便提出了坚持、运用、发展的方针，于近四、五年来历届年会上都大力呼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为建设而纪念，以建设做纪念。对于《讲话》的精神，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它指出的方向，树立的基本原理原则，要坚持、运用、发展。坚持见于运用，运用则必发展，落实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

那么，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怎样理解呢？它又是怎样体现着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呢？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把毛泽东正确地开始却作歪了的“下篇文章”改正过来再接着作下去。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健康地坚持运用发展。社会主义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由空想到科学第一次飞跃，列宁、斯大林由理论到实践第二次飞跃之后，又到来邓小平、江泽民由计划到市场第三次飞跃。对我们人人说来，它不仅是理论与理想，更尤其是在创建中的生活，在开辟着的时代；是为之悲欢、为之歌哭、为之忧患奉献、为之兴奋自豪、离开便思念、而永生热爱着的祖国；它是我们神牵魂系、生息、劳动、学习、成长于其中的现实。在如此这般的现实基础上，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更主要是由风起云涌的新人新星共同创造的意气风发、异彩纷呈的新时期文艺。弹指一挥，历经十五春秋，如今已跃上90年代台阶，方兴未艾，“犹待攀登披荆棘”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使着现代中国文学面貌发生急剧而深刻变化的

新时期文艺，在题材处理上，从政治反思推进到文化反思、生命反思，从而更全面也更深沉地突入人性以及人际关系以至天人关系的领域；在艺术方法上，从现实主义的恢复与深化，推进到多种表现手法以至多种创作方法，直到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及其变种等等争奇斗艳或互渗杂揉；在人物描写上，从英雄歌颂新人礼赞推向大量常人琐事的刻画，甚至“凡星主义”的张扬；在创作视角上，从注重内容到注重形式，注重独立的文体、独特的叙述方式与独特语言的探索及创新。有的评论者认为，西方走过的一百多年的文学道路，中国在这短短十数年间便走完了。从表象上看势亦近似，而在深层里实质上它还是逻辑地表现着现代中国文学进程。有识之士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曾指出说：所谓“20 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③新时期文艺显然表现着这一犹在继续中的文学进程在臻于完成，并且预示着要迎接 21 世纪更加壮阔辉煌而轰响的日出。这一切都宣告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着最宽广的无限丰富的艺术境地，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着的范畴，生着一付有极大包容量且最富消化力的胃口。邓小平同志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纲领。在文艺领域，最有关键意义、影响也最深远的是，他从文艺的丰富历史实践出发，以极大的理论魄力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代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并指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虽然不能脱离政治，在号召作家艺术家从人民那里吸取创作的

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主义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又鲜明地要求各级领导根据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促进文艺的繁荣和水平的提高，主张“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而“不要横加干涉”。这样，便认真地且实际地提倡并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从而为我国文艺的繁荣创造了宽松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谐和的社会历史环境。由于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频繁，80年代出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中西文化的大撞击。这自然是对于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有力的推动。而正是这现阶段新时期文艺，亦即我们在实践中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较之它所承传的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或一个阶段，无论是在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无论是在作家队伍的成長与壮大方面，无论是在文学的功能与结构方面，显然取得了更大更广泛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有的论者认为，自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算起，便开始了“毛泽东时代”，在其前上溯到“五四”运动是“前毛泽东时代”，在其后即犹在延续着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后毛泽东时代”。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和成熟，表现出国际共运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双向跃进，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奠定了汇入世界文学总格局的始基。这些深刻且深远的涵义，假如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是迷离恍惚，难于体认的，那么站到90年代新时期文艺达到的高度，来作一世纪的回顾，岂不就显得清清楚楚的吗？自然，凡此一切更集中更卓著地实现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理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实践。这些也便是我们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总体认识。

新时期文学，在建设中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于其迅猛前进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而不遇阻力或不犯失误的。有许多困难必须克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突出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唯政治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我们不再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在口头上也不再高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有的人总习惯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文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问题是单从政治看，只从政治看，在不涉及政治的时候也提到政治高度来判断。于不觉间生长一种“卫道精神”。实际上近似五六十年代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虔诚的狂热”，“无容置疑的自信”，对一切异己的“不能容忍性”。这样，艺术、审美便往往估量不足，甚至成为他们的盲点，文艺上的不团结以至宗派情绪即使不正是从此生起，也难免是由以促成。要实现文艺战线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首要是“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式的唯政治思维方式。其次是非理性主义的泛滥。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于西方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入中国后，被导向极端，则造成了不同层面的混乱。在低层面，与固有的落后迷信相结合，而衍生为亟待打扫的“黄灾”、“非害”，毒性极烈，这无庸多说。在高层面，更极具感染性地诱发起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崇洋猎奇的风气，实亦弊多益少，其甚者至如反道德、反文明、反艺术，礼赞“兽性冲动”，宣扬“黑色颓废”，疏离生活，淡化政治，鄙薄从正面树立积极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直到放言精神文明的消解。这些都是有损于人民利益的。因此对文艺的非理性主义加以理性审视，吸取其合理因素，而清洗其剧烈毒质，实属当前急需。第三是拜金主义的渗入。文艺建设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亦应看到，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也还存在值得充分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情势下，拜金主义的浊浪冲击。文学日益商品化，文艺的生产、消费势必纳入